

中日
近现代
女子学校教育
比较研究

谷 峪 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中日近代女子学校教育比较研究

程方平题





为自己学生的书作序心情是高兴的，但也怕摆不脱“舐犊之情”。谷峪是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后考入日本东京大学读博士课程的，她在日本六年期间，我去日访问时虽见过几次面却因来去匆匆未及详谈，只是凭我对她的了解猜想，她不会“无情岁月闲中过”的。及至她回国重返东北师大，我一直盼着她对乡梓的回报，这本《中日近现代女子学校教育比较研究》的问世，在我看来是“迟到的成果”，但确是可喜的成果。

女子教育作为教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近年来研究的人不多，而就女子教育与国外进行比较研究的则更少。谷峪从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切身感受出发，以“女性的立场”对同处于儒教文化圈的中日近现代女子教育进行比较，在借鉴中落脚于现实，其初衷是朴素的，视角是独特的，立意是新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被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现象，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而且，妇女解放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认识工具，把中国和日本近现代女子教育的萌生、演进和发展，放在民族解放、妇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作了翔实地考察、梳理和比较，根据中日

两国历史的不同特点分析了克服儒家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争取妇女受教育权的艰难历程。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问答交谈。作者在分析之后必然得出的启示是：中国和日本在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是与摆脱历史因袭负担相伴的；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女子教育事业，仍需进一步继续清除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

从该书的结构看，作者在努力梳理中日两国女子教育的“史的线索”，体现了历史的、社会的、发展的认识方法。然而，认识昨天是为了今天。在综述一章里，作者的“结论性的思考”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基于对我国目前虽已进入小康社会但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悬殊的国情，尖锐地提出妇女受教育权并未得到真正的保障，性别歧视现象仍然存在，数量不小的没文化的“未来的母亲”将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并不只是一般的作维护女权的呼吁，而且从一般教育与女子教育的联系和区别的角度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比如，关于在全社会进一步清除封建主义男尊女卑思想残余的影响，真正树立男女平等的观念和风尚；关于坚持依法治教，为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关于加大政府作为力度，实行教育扶贫，发动社会力量因地因条件制宜多层次地发展女子教育等问题，作者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思考，其可行性的现实意义是明显的。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核心是追求未来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研究女子教育当然是为了女子的全面发展。在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呼声占舆论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作者鲜明提出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前提，要承认性别差异和女性自身的弱点，并主张

在推行素质教育中应注意对女性进行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的教育和娴淑性格的培养。这个看似“冒然”的观点，经作者的阐释会使读者感到入情入理、符合教育规律，会有助于女性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角色定位。

从书中附录的注释可以看出，作者花费很大精力搜集、披阅了大量史料并进行了纂辑。或许是受日本学者实证的研究方法的影响，连十分具体的史料也不忍割舍，这固然增强了翔实性，但也使人感到有些繁琐，留待读者去品评吧。



2002年4月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日本女子学校教育的萌芽阶段	(1)
第一节 儒教道德下的才女教育	(1)
第二节 明治时期男女共学状况	(7)
第二章 日本社会的男女共学运动和男女共学论	(21)
第一节 女子对高等教育的要求	(21)
第二节 20 年代女性的入学意识及其实际状况	(46)
第三节 30 年代后男女共学论的深化	(70)
第三章 日本男女共学制的确立及发展	(87)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育改革与男女共学 ...	(87)
第二节 高中男女共学实施后社会上的男女观之 变化	(106)
第四章 日本近现代社会的男女共学	(121)
第一节 高中生的男女观, 男女交际观的变迁	(121)
第二节 大学中的男女共学状况	(131)
第三节 社会和男女性别观的变化	(149)
第五章 中国女子学校的形成	(178)
第一节 女子学校制度的形成	(178)

第二节 女子学校的设立及其教育实践特征	(208)
第六章 “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	(236)
第一节 有识之士的妇女解放论	(236)
第二节 “五·四”运动和男女共学	(245)
第三节 不分性别的单轨制学制的确立	(251)
第七章 中国现代女子教育	(257)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女子教育	(257)
第二节 建国后女子教育概观	(271)
第八章 综述	(289)
第一节 问题的提起	(289)
第二节 关于当代中日两国女子教育的思考	(297)
附录	(310)
后记	(332)

第一章

日本女子学校教育的萌芽阶段

第一节 儒教道德下的才女教育

一、寺子屋、私塾的学习形态

随着 18 世纪末 19 世纪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发展，以教授读、写、算能力为主的寺子屋和接收女子入学的私塾都增加了。在此之前，作为日本士族阶级的男子教育机构——藩校，全国大约有 3% 接纳了女生入学，但都是在其它的教学地点，教授一些儒教女训、女红等女子教育特有的内容，属男女别学的性质。据 1892 年文部省在全国调查制成的“私塾寺子屋表”^①记载：私塾、寺子屋的开塾年代大多是 19 世纪以后，全国寺子屋总数的 62.5% 是女生，女学生占全体总数的 20%。在女子入学率高的东京，488 所学校中男女生都在学的有 483 所，男子校 4 所，女子校 1 所，‘共学校’占 99%。学生数量也是女子占全体的 45.2%。几乎和男子的入学率大致相当。京都、大阪‘共学校’分别为 65%、82.4%，女学生大约占学生总数的 1/3。并且，除了东北和九州各县女子入学率低的地方，许多县都是‘共学校’的形式比男校、女校分开的形式多。

在这些寺子屋里，不可能进行这种字面意义上的共学。大日本教育会发刊的《维新前东京市私立小学校教育法及维持法调查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教学场所规定了一种原则是男生与女生分开座，即“男座”，“女座”，值日生以及名簿等都是男女区

别对待。^②更有甚者，教材的内容也不一样。比如：临摹用的字帖，在色彩、数字、名头等方面虽然一样，但收条、礼单、江户方角、书信、商业往来、信息往来、各种文书证件、门庭往来、千字文，唐诗选等是只有男生才学习的；而女生学习的东西中有源氏，女子江户方角，女子信息往来，女子门庭训育等，并且除了名头之外，大多是日语的假名文字。除此之外，教男子大字，教女子小字。据说读书的女子很少，其书也不过是《百人一首》^③、《女今川》、《女大学》等，和男子大不一样。总之，是以儒教的女训书之类以及与女性生活相适应的教材。以个人指导为中心的寺子屋，即使男女生在同一教学场所，由于教材不同也明显地存在性别差异。在女生少的寺子屋里，似乎是男座、女座不分开，尽管如此，教材也还是各自不同。

学算术的女子几乎是“零”。^④学裁缝、茶道、花道等学生都根据自己的愿望能取得资格。^⑤在东京教裁缝、茶道、花道的寺子屋仅有 10 所学校，之所以这么少，是因为在寺子屋以外还有许多教这些课的师傅。

从这种女子特有的教育体系来看，虽然寺子屋的读、写、算学习，在教材上大不相同，但却可以说具有许多与男子教育（或男女共学）的共同特点。

寺子屋的女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东京约 26%，京都约 6%，大阪约 4.5%，可见东京的女教师非常多。从表 1 可见寺子屋这样的私塾主人的身份。由下表我们可看出平民私塾主人约占全体的半数，女性私塾主人 35 人占总数的 12%。（见表 1）

关于私塾，东京 123 所学校中有 48 所学校有女生，占总数的 39%，女生占学生总数的 8.3%。男女都在学的私塾的学生总数女子比率约 20%，约 5 个人中有 1 个人。可一个男女生都有的学校，女教师比率低于 7%。教学科目仅限于汉学的私塾有 15

所学校，这些私塾的女生数从1个人到15个人不等。与此相同，京都的34所学校都有女生，分别占总数的18%到40%。

像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存在不少女子私塾主和教师，这充分显示出到19世纪中期，女性中有许多人在接受教育，已经有相当一批有学识的人了。由此也可以推断，长期的学习和教育，给女性带来经济上的独立这一事实已被相当一部分阶层所首肯，并在实践中也得到证实。

当然，从当时农民约占人口80%的这一实际状况来考虑的话，这些能够受到教育的阶层仍然是极少数，^⑥大多数女子都在接受经验主义的教育，即使是农民阶层，随着共同体的瓦解及阶层分化的加深，以上层农民为中心的不同阶层、不同家族的门庭教育也随之而诞生了。

二、《学制》下公、私立学校的男女共学

1872年的《学制》，参照欧美的教育制度，废除了江户时代以武士为对象的藩校和以庶民为对象的寺子屋这两个系统的学校，将一切学校置于国家管理之下，合并成单轨制的大学、中学、小学这三种学校类型。并以现代教育机会均等的观点为基础，提出“自今之后众庶人民无论华士族与农工商，至其妇女子，必期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同时还规定了8年制的寻常小学男女学生都应该毕业。这个学制站在基本的男女共应接受同样教育的立场，除了小学中有单设的女子小学，在其教学科目方面增加了女子手工艺之外，没有涉及到其它任何性别差异问题。

由于《学制》发布而规定的小学，是以过去的寺子屋和私塾等为基础深化来的。1875年的就学生人数，女子超过了46万人，男子不到137万人，公、私立大部分都是男女共学的学校。据文部省第3年报附录第2记载，这一年的公立小学中，东京府仅有

樱川女学和麦町女学两所女子学校，但总的来说女子就学率很低，男子校和女子校分别设立的状况在日本全国较常见。例如：金泽地区有男校 17 所，女校 4 所，男女共学的学校 0 所。^⑦由于女子学校少，有的女子学校一所学校的学生数就有 330 人、431 人那么多。除此之外，也有像安宅小学(男子 149 人)、安宅女儿小学校(女子 65 人)、寺井小学校(男子 149 人)、寺井女儿小学(女子 35 人)、中岛小学(男子 55 人)、中岛女子小学(女子 28 人)，这样以分设女子小学为形式来区别男女的区域。

私立小学的大部分是男女共学的，但也和公立学校一样，仍存在一些女子小学，还有的学校虽然不用男校的名称，但实际上也是没有女生的小规模私立男子小学。开设的课程很多县都是男女生一样，在男女共学和男女一样的教育基本上被承认的学制时期，小学除了石川县那样封建味道浓厚的旧藩城的市民集聚地之外，几乎表面上看不出男女分别设校的状况，公、私立学校在表面上大部分都是男女共学的学校。

中学在幕府末年已经开始出现了男女共学制的学校，据文部省年报 1875 年中学一览表记载，在 121 所中学校里，38 所学校有女生在籍，占有学校总数的 30%，在学生总数 6449 人中女生有 202 人，占 3.1%。男女共学校平均一所学校有女生约为 5 人，因此，不设女生班而代之以男女共学的地区较多。

虽然与男学生一起学习很辛苦，但是也给予女生以通过努力可获得与男子同样的知识能力的信心。据 1875 年文部省年报师范学校一览表中所载的 91 所师范学校中，除了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和石川女子师范学校是女校之外，还有 5 所学校有女生在籍。^⑧专门学校一律是男女共学，外语学校的 99 所中有 37 所是男女学生都在籍。外语学校多为英语校，其中女学仅有国立东京女学校和京都的公立英女学校，加上学法语的 2 个人，其在籍学生

数高达 438 人。

据文部省年报载, 1877 年在专门学校学习的女生有 123 人(其中数学 82 人、医学 39 人、绘画 2 人), 到了 1879 年, 在大学及专门学校 124 所学校中有 21 所学校是男女共学的学校, 女生人数总共计 210 人。专业也扩展的比较广泛: 法律学(1 人)、医学(53 人)、英语学(97 人)、航海学(9 人)、数学(37 人)、化学(13 人)。在其他的年度里, 也有学习农学、理学等专业的女生, 除了学英语的一部分人外, 全都是男女共学校的学生。

“学制”期里, 大部分教育机构是男女共学, 除汉学和英语之外, 在各领域里都有女子的存在。这一时期男女共学学校多的原因是: 由于身份制社会的瓦解, 以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的武士阶层为中心, 即使女子也要通过学问在世间寻找生存立足之地。并且, 不问身份性别, 出人头地, 为商业的繁荣昌盛而学习实学, 这种政府的教育政策, 也为男女共学提供了一种良好的学习前提。可是, 由于当时学校尚少, 且没有完善的制度和条件, 只是作为男子的教育机构暂时收容女子入学, 初步实现了共学。

从“学制”期女子 20% 左右的低就学率这种情况可看出, 受这种制度直接影响的人不那么多。尽管如此, 这种状况也提醒人们重新审视男女观。在男女共学的初始阶段, 由于男子抱有很强的男尊女卑的观念, 认为和女子一起学习是不洁, 对女子也进行各种各样的嘲笑和调侃, 可这些现象由于越来越多的女子参与学校生活也逐渐减少, 并且随着学制出现以后, 男女共学现象的增加, 深化了男女两性间的相互理解和意见的交流。在“学制”期, 由于男女共同使用欧美的和直译的教材以及学习相同的教学科目, 虽然没有像欧美那样教, 但至少对女学生的开明意识产生了鲜明的影响。让女子进入公立寻常小学的家庭, 不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原因, 以士族为首的医生、学者、文人等与汉语世界多少

□中日近现代女子学校教育比较研究

有关的家庭居多。在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公立学校与藩校属于同系列，因此，与性别无关仍旧是与一般百姓的距离很远的学习形态。所以，这一时期有许多女子到裁缝塾和手把手教的私塾老师那里去学习。

京都和大阪的小学附设女红场，^⑨也是为了迎合当时女子需要接受教育的要求而设立的。明治维新前在东京等地连女寺子屋都出现过，使良好的设备得以发挥作用，人才能够接受教育，男女在校内从开始的时候就追求着一种存在性别差异的教育。特别是把女红场放在学务科管辖的大阪，把已经存在的裁缝塾作为女红分局，这里的学生一周只到总局登校一次，作为接受一般教学科目教育来处理。^⑩这对提高小学女子的就学率起了很大作用，数年后，经过手工艺学校，裁缝学校等几度名称的变更，1882年后，以改组小学附属裁缝场的形式纳入了近代学校体系。^⑪

从全国来看，只实施男女同样教育的县虽然很多，但这些县也在酝酿着设立男女分别的教则和裁缝科。^⑫正如西村茂树在巡视报告中所感：看了各县的女子学校和小学裁缝科，深感女子将来的事业与男子不同，其教育当然也不应该一样。^⑬

1879年的“教育令”，就是依据这种实际状态和出于性别差异的考虑进行修正的。

表1 东京寺子屋塾主身份一览表 (人)

旧幕臣(含坊主3名)	41	浪人	15	修道者	1
旧幕臣勤务员	12	武士之女	9	僧侣	8
旧诸藩士	34	平民(町人)	112	其它	4
士族	21	平民女	26	计	289
		神官、社人	6		

出典：小木新造《东京庶民生活史研究》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1979。(P456)

第二节 明治时期男女共学状况

一、在小学男女共学问题上的论争以及知识阶层的男女观

实行男女共学的小学，在“教育令”公布期间，男女同校、共学的问题当然也成了社会关注的中心议题。

1886、87年，大日本教育会把小学的男女共学问题多次作为一种议题来讨论，1886年12月12日下午1点在神田区一桥外第一高中校内帝国大学讲义室召开的集会上，当时东京府学务科长庵地保的发言引起了争论。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仅以女子为对象教裁缝和仅以男子为对象教体操，^⑭不成为共学的理由，希望能够就读书、算术、地理等学科，男女都在同一场所进行授课的利害得失进行讨论。当时有的意见是认为要把日本的教育现状和男女的存在状态放在一起考虑。当时即使是欧美各国，共学问题也是正在讨论中的课题，其实施状况也各有所不同。庵地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主张日本的知识界人士要参考欧美的共学论，从日本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考察共学问题。《大日本教育会杂志》除了刊载了当天的讨论内容之外，包括文件、发言等赞同、否定的意见也连续发表了数刊。^⑮特别是《女学杂志》61号（1887年4月23日）等发表了《可否男女共学》的社论。《教育报知》也报导这个问题。

可是，就其内容来看，即使是持赞成论的人，也不过主张除了裁缝和体操之外都应是共学形态，并且，仅对当时的3年制和4年制的寻常小学的共学表示赞成，许多人反对在2年制和4年制的高等小学实行共学，赞成在大学实行男女共学的只有《女学杂志》。这一阶段的赞成论和反对论陈述的理由有很多，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

赞成论^⑩

(1)比只有男子或只有女子的集团，在智育、德育两方面都有许多相互可以学习的，特别是对女子的提高很有作用。

(2)对培养像西方那种具有独立性的，在社会、家庭都具有独立见解的女性，共学的形式非常有效。

(3)共学制度是比较经济的。

(4)由于社会是由男女共同构成的，所以处在社会组织构成预备、准备阶段的学校里，进行男女共学是必要且妥当的。

(5)从生理的差异上看，到 10、11 岁左右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所以共学是可能的。

(6)从“学制”颁布以来男女共学的成果可看出，共学给男女提供的交际的场所，对协调相互间的关系、加深相互理解很有必要。

反对论^⑪

(1)男女在身体、性质、德行方面所达到的目的，以及将来的业务方面的要求不一样，共学是勉强的。

(2)在男尊女卑根深蒂固的日本，对男女所期待的教育程度、内容也不一样。所以，实行男女分校，可提高女子就学率。

(3)与现在的家庭(即父亲家长制)存在方式相适应而进行的教育，不应该对男女进行同样的教育。

(4)由于女子在性生理方面不具有完整的知识，共学有种种潜在的危险。

(5)日本现阶段没有很好的管理共学制学生的教员。

(6)共学反而有害于女性的发展。

在这些理由中，特别是持反对论的人中，把男女的性质不同用阴阳学来证明，男女内外有别的这种说法，把女性的活动领域

限定在性别分工分业上，把它作为反对共学的理由等，可视为是受着具有浓厚色彩的儒教道德的影响。^⑬

并且，在这里“男尊女卑是自然的真理。^⑭”对于此，持赞成论的人，拿出了学制以来共学的互相理解和互相协调这一事实来进行了驳斥。从全国来看，即使有极少的男女共学方面的经验，那也实实在在是男女观变革所赋予的。换言之，共学对当时中产阶级以上的男女，被认为是提供了一种非常值得研究的男女交际的场所。

当时，福泽谕吉主张以防止离婚为目的的男女交际。《女学杂志》25号(1886年6月15日)，介绍了其大概的意思，其最重要的论点是怎样形成一种男女交往的氛围与方式方法。这在《女学杂志》61号社论中也有所阐述，共学的有利之处在于男女交际方面，共学制也在这方面比较引人注目。^⑮可是，对于这种意见，有人认为偏僻山村中有一起玩儿的童男童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男女交际，因此没有必要进行男女共学。^⑯还有一些持赞成论的人强调男女作为人来说是同类，认为传统女性的所谓的柔顺的“美德”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美德”，那是把一种有气无力的充满自卑心理的人错认为是具有美德的人，把不活泼错认为是“顺从”，^⑰持反对意见的人在这一点上完全站在对立的立场上。

这些由有识者阶层的男性发起的具有相当影响的关于男女共学的论争的特征是：首先，从教育的普及程度以及当时的社会常识方面来看，既不是中等教育又不是高等教育，是以初等教育为对象的，并且是从上述那种明显地蔑视女性的观点上来进行反对的。还有，后来成为一个重要的反对理由之一的扰乱风纪这点没太强调。可是这并不等于一点儿也没有提到。比如：反对共学的日下部三之介就曾经说过：日本的男女青年在盂兰节的时候一起跳舞不好，并希望把男女生的座位分开。其理由是：根据婚姻法

和宗教的规定和习惯，维持人与人之间伦理道德的原则西方社会和日本现状有所不同。^③

这一时期的男女共学论争的另一个特点是由男性的有识之士阶层发起的。并且，其中的大部分是士族出身的人，对于自己的阶级以外的男女生活，表示很不理解的人很多。受男女共学制直接影响的年龄段的人和女性，也没有对男女共学提更多的要求。因此，当时的妇女论以及女子教育论都是一样的。比如：当时进步的男性有识之士参加创办的《明六杂志》上的关于男女同权的论争，^④对于女性的一切公共性的权力也概不承认，充其量只不过是主张家庭内夫妻间的平等，如主张“夫妇有别”、“男女守分”、“夫妇同体”等，把类似这样的性别分工和夫唱妇随的男女关系视为理想化的主张更占优势。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明治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由于把妇女解放基本局限在家庭内，他的女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培养掌握文明普通常识的家庭妇女。^⑤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性别角色分担的方法，从现象上看与儒教道德提倡的“男女内外有别”相类似，但从形式上的男女同作为人是平等的这一前提出发，和把男女看成是立场不同的主从关系的儒教道德，是有明显差异的。抨击儒教的女性形象，提出新的女性观，从这一点来说，只有像福泽这样的启蒙思想家才能完成的，当时具有相当积极作用。可是以国家独立、富国强兵为根本愿望的福泽，把妇女解放看成是为了达到其目的的重要手段。比如，性欲的解放是与健全的女性造就优良后代直接相关的。并且主张这更进一步有利于改良人种、推进和发展富国强兵政策的实施。同时提出在国际上隐瞒男子的不端行为，虽然为保持社会安定而积极肯定艺妓、娼妓的存在，但认为她们是“人类以外的丑物”。^⑥

他还主张，妇女解放不仅要局限在学校教育上，而且还要在